



David E. Cooper

Metaphor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 译丛

隐喻

【英】戴维·E·库珀 著
郭贵春 安军 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 译丛

David E. Cooper
Metaphor

隐喻

【英】戴维·E·库珀 著
郭贵春 安军 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Metaphor

By David E. Cooper

Copyright © 1986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Edition © 2007

by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业经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协助取得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责任编辑 侯慧菊 装帧设计 汤世梁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译丛

隐喻

[英]戴维·E·库珀 著

郭贵春 安 军 译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上海市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200235)

网 址：www.ewen.cc

www.sste.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90×970 1/16

字 数：260 000

印 张：16

版 次：2007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 000

书 号：ISBN 978-7-5428-4406-4/N·726

图 字：09-2004-325

定 价：39.00元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译丛”编委会

主 任：郭贵春

副主任：成素梅

编 委：陈 凡 高 策 桂起权 胡新和 金吾伦 刘大椿
 刘晓力 乔瑞金 任定成 魏屹东 殷 杰 郑毓信

总 序

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进路是由逻辑经验主义奠定的。逻辑经验主义作为第一个成熟的科学哲学流派,首先基于经典科学的研究模式,在拒斥形而上学和区分理论陈述与观察陈述的基础上,赋予观察事实纯客观的优势地位。之后,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和非充分决定性论题的提出,极大地弱化了观察事实在证伪或证实理论以及理论选择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历史主义学派的观点更是有说服力地突出了形而上学和科学共同体在科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方面,科学哲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明显地表现为,在保证科学理性和科学进步的前提下,更多地强调了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在科学方法论中的作用与意义,集中讨论科学目标、科学进步、科学成功、科学手段、科学成果、理论建构、理论与观察、理论与经验、理论实体的本体性等问题,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科学实在论、非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既代表了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同时,也面临着在自身原有的框架内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

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一批人文社会学家开始运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对产生科学知识的理性基础与科学认知活动的客观性前提提出了实质性的质疑。他们通过对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室活动的跟踪与观察分析,运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术语重新解释科学事实、科学知识、科学的客观性等基本概念,并且极端地否定了科学知识的认识论本性。他们认为,传统科学哲学的发展所依靠的是错误的归纳主义和基础主义的认识论,一旦摧毁这些基础,那么,科学哲学就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其命运必然是:要么被遗弃,要么至少在适当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框架内得以重新建构。

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这些基本走向在整体上主要体现为科学解释学与科学修辞学的转向。问题在于,科学解释学在重申了被科学语言学所抛弃的关于真理和有效性的认识论问题的同时,却把科学降低为一种形式的文化实践。因为解释实践的过程,并没有提供关于客观性和真理等认识论概

念的参照基础,这样,当科学哲学家追问解释的有效性和解释的范围等问题时,就无法确定一种解释的适当性或真实性。解释学转向所带来的解释的普遍性和解释的语境论特征,使真理成为相对于某种解释循环的概念。由于解释总是在蕴藏社会因素的信念背景下或语境中发生的,因此,必然会注入与权力和控制相关的政治因素,很容易走向相对主义。科学修辞学转向主要关注科学文本及其形成、表达与传播中的社会学、解释学或交流等方面的问题,试图通过研究科学话语与科学争论来理解科学的认知价值。但是,修辞过程中存在的劝导因素很容易忽视理性逻辑,显著地突出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因而同样无法避免走向相对主义。

从方法论意义上看,以科学的客观性和理性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研究路径,以及对科学实在论的辩护,将面临各种不同形式的相对主义科学观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围绕“索卡尔事件”展开的学术争论已经彻底暴露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直接冲突。面对矛盾与冲突,科学哲学的研究究竟应该如何摆脱困境,如何切实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结合起来,阐述一种科学家的科学哲学,或者说,大科学时代的真科学的科学哲学,而不是以逻辑为基础的科学哲学(逻辑实证主义),也不是单纯以科学史为基础的科学哲学(内在论),更不是人文社会学家所阐述的科学哲学(外在论),或者说,不是科学叙事的科学哲学?

首先,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或研究基点,才能够将更广泛的背景融合一气,在理性科学观与非理性科学观之间架起桥梁,达到更本真地理解科学的目的。这既是当代主流科学哲学研究的一项主要任务,也是我们承担的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趋势研究”攻关项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我们认为,本项目的研究除了组织国内外的学术力量进行联合攻关,形成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特色之外,为了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学术优势,弘扬优良的学术传统,以积极的姿态推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以严谨的学风规范中国科学哲学的学术耕耘,远离浮浅时髦的学术宣扬,以兼收并蓄、扎实稳固的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中国科学哲学的繁荣与发展,我们还有义务引进、翻译代表西方科学哲学最新进展的优秀著作,实质性地推动我国科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迈上新的台阶。这正是我们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合作共同推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译丛”的初衷所在。

在丛书即将付梓之际,作为丛书的组织者,有许多发自肺腑的感谢之

言。首先,感谢每一本书的原作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曾对译者的翻译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其次,感谢每本书的译者,他们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按时完成了翻译工作;第三,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潘涛博士和侯慧菊女士,他们作为本套丛书的总策划者,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许多心血;第四,感谢每一本译著的责任编辑,他们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弥补了译者翻译上的缺陷;第五,感谢丛书的编委会成员,他们的学术声誉与长期以来对“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工作的大力支持,极大地促进了本中心的发展。

郭贵春 成素梅
2006年6月1日

本书受教育部 2004 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研究”(04JZD0004)和国家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基金资助

内容提要

本书系统研究了语言中的隐喻现象,正确评价了其作为不同话语形式所作出的贡献,提醒读者重视隐喻这一问题,证明了以隐喻为代表的非字面语言,不仅在诗歌中存在,也广泛存在于科学话语和日常语言中。隐喻这一主题应该成为语言哲学家们研究工作的重心,而不是仅仅作为某种附属物。我们需要发展一种全面而一般的语言哲学,对隐喻问题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

作者简介

戴维·E·库珀(David E. Cooper, 1942—), 英国哲学家。在牛津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 曾任英国亚里士多德学会、尼采学会、教育哲学协会主席, 现任英国皇家哲学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达勒姆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语言本性的哲学》(1973)、《语言的知识》(1975)、《隐喻》(1986)、《意义》(2003)等十余部专著。

中译本序

能够为自己1986年出版的著作《隐喻》撰写这篇简短的中译本序,我感到非常高兴,在此谨对本书译者表示由衷的谢意。在本书进行论证的过程中,我列举了大量隐喻例句。为这些句子寻找合适的中文对应译法,必定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是一项深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众所周知,决非所有的隐喻都具有某种“国际性”。遗憾的是,由于我对中文所知甚少,以致无法欣赏两位译者的劳动成果。

这部著作能够有机会和中国读者见面,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我没有想到,世界上的其他文化也如此充分地认识到了隐喻的重要性。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尤其是道家学派的先贤,探索了隐喻以及其他修辞方法的力量。正是由于这一事实,葛瑞汉(A. C. Graham)*指出,“道家哲学的所有经典著作,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些古代思想家们也充分意识到了隐喻在日常交际中的重要性。葛瑞汉写道,“庄子的核心思想就在于认为:除非是在某种人为创设的智力辩论情境中,否则语词是没有一种固定意义的。”语词不是通过应用某种“规则”而是通过“对所有成功言语行为根源那种不可分析的诀窍”的洞悉而得到理解的。庄子令人信服地宣称:隐喻是一种“正常的”或“首要的”话语模式。这一点也正是我在本书中以一种批判而又同情的态度详细加以讨论的内容。

我撰写本书的初衷在于提高西方读者对隐喻的重视程度。例如,提醒他们:以隐喻为代表的非字面语言不仅在诗歌中存在,也广泛存在于科学话语和日常语言中。同时我希望,最好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服语言哲学家们:隐喻这一主题应该成为他们研究工作的重心,而不是仅仅作为某种附属物。当然,自1986年以来,有许多关于隐喻的哲学类书籍陆续问世;比起我当初提笔写作的那个时代,今天的人们对隐喻为不同话语形式所作的贡献有了更为正确的评价,也更迫切地感到需要一种能够容纳隐喻现象的综合性的

* 葛瑞汉(1919—1991),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伦敦大学东方学教授。——译者

语言哲学。

在过去的20年中,我多次重新考虑过隐喻这一主题,在我2003年出版的著作《意义》中即有所体现。但关于在《隐喻》这本早期著作中所采取的立场,我只想在一处作出修改。读者们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第2章中,我维护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观点:“新鲜的”、“活的”隐喻没有意义,因为它们并不陈述一个确定的命题。现在,我对“意义”这个概念持一种更为宽泛和自由的理解。我更倾向于认为:句子或言说具有一种“意义”,并不要求其陈述一个命题或具有一种确定的真值条件。这种观念更接近于我们对于“意义”这个富有弹性的概念的日常的、直觉的理解。但是,应当强调的是,这并不表示一种对于戴维森和我早期所持立场的本质性背离。我对这种观念保留一种批判态度:为了具有意义,隐喻言说必定传达一个确定的命题。事实上,我更倾向于赞同庄子的观点。隐喻言说(事实上也包括非隐喻言说)并不是“雏鸟初试啼声的啁啾”,因为它们是有意义的;但是要有意义,它们也无须具有某种“固定的意义”。* 我期待听到《隐喻》中译本读者们的反馈,以便能够得知自己是否正确地把握了与中国古典哲学大师在观念上的某种契合。

戴维·E·库珀

2005年4月

* 《庄子·内篇·齐物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𦵿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译者

致 谢

首先感谢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提供资助,使我能够于1985年在德国盘桓数月。在此期间,我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有关隐喻的德文文献。还应当感谢奥黑尔(Anthony O'Hear)和塞恩斯伯里(R. M. Sainsbury)先生,他们校阅了本书打印初稿的大部分。尤其感谢戴维斯(Martin Davies)和威尔逊(Deirdre Wilson)先生对本书每一章节所作的深刻而细致的评论。最后,我对圣安东尼奥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 San Antonio)哲学系秘书雷耶斯(Becky Reyes)女士深表谢忱。在她的帮助下,本书打印定稿得以顺利完成。

目 录

中译本序	1
致谢	3
第1章 隐喻的凸显	1
1.1 划界问题	4
1.2 “隐喻及其他”	10
1.3 字面的与非字面的	17
1.4 “一个多维度的问题”	28
第2章 意义与隐喻	36
2.1 传统观点	37
2.2 隐喻与言说者意义	54
2.3 无意义的隐喻	71
第3章 隐喻言谈的界域及功能	93
3.1 “死隐喻”	93
3.2 我们为何隐喻地言谈?	110
3.3 再划界	139
第4章 隐喻与真理	156
4.1 替代性真理	157
4.2 图式、摹拟与“视如”	170
4.3 无真值的隐喻	189
4.4 隐喻的首要性	204
注释	221

第1章 隐喻的凸显

[1]

我依稀记得,当自己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隐喻(metaphor)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但同时也对英语老师的讲授方式感到失望。我甚至可以回忆起这两种不同感觉产生的根由。在那个时代,人们往往在英语语言和英语文学之间作出一种明确的区分。这就意味着,老师以两种方式提及隐喻。教语言课的老师提及隐喻,主要把它作为修辞练习的一部分。在这种练习中,学生们不得不学习掌握一长串艰涩的名词,比如提喻法(synecdoche)、讲话中断法(aposiopesis)等。同时,学生们得知,这些术语所指称的是“言语修辞格”(the figures of speech)。成功地完成这些练习,包括掌握每一个术语的定义,并且能够运用每一种修辞格的一些例句。然而,在文学课上,学生们千辛万苦掌握的这些修辞格的区别大都被忽略掉了。文学课的重点在于搜集诗人和小说家们所用的修辞格案例,这时毋需更多地关注它们的名称,也不必对之作出“鲜明”或“含混”的判断。

现在看来,很难说这样一种隐喻教学法是能够令人满意的。首先,一个小学生绝不会去关注这样的事情:在那些行文最为平淡无奇的烹饪书籍、最枯燥的科学文本的每一页中,都可能散布着隐喻。这种教学法往往容易给人造成的印象是:隐喻以及与其相类似的修辞格都被严格地限制在“纯文学”(belles-lettres)的领域之内。此外,在靠死记硬背的工夫去区分那些看上去数不胜数的言语修辞格的同时,却没有努力尝试给出一种更为一般性的理解,即对究竟是什么把这些修辞格统一起来作出某种说明。事实上,除了使用一些明显回避问题实质的术语外,人们究竟如何一般性地区分比喻性言谈的界域呢?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足够的重视。最后,隐喻语言(metaphorical language)到底是怎样一种令人迷惑的现象,这样一层意思也并没有很明白地传达出来。如果仅限于指出,使用隐喻是我们出于“追求某种效果”的目的,那么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于事无补。之所以错误,是因为这并不是那些普通的言说者之所以在其日常生活中使用隐喻的原因;之所以于事无补,是因为下面的问题仍然是存疑的:写下那些在表面上看来明显错误、但同时又能被任何一个接触到它的人所理解的句子,从根

[2]

本上来说如何能够是“有效的”?

可能是由于在学校里接受了这种令人沮丧的教学方式的原因,我曾经一度丧失了对隐喻问题的兴趣。当然,偶尔听到和读到的一些特别的隐喻仍然会对我的心灵产生某种触动。从大学时代起,我开始考虑关于语言本性的一般哲学问题。当时的人们要么完全忽略隐喻,要么把它贬低为一种精神脚注。我也没有脱离当时所流行的这种窠臼。隐喻确实不会阻碍人们回答那些一般问题,但它需要简短的补充。

我对隐喻问题重新产生兴趣,得益于阅读两位著述家的著作。他们并不是大多数人心目中最重要隐喻著述家。这两人就是尼采(Nietzsche)和帕斯卡尔(Pascal)。他们相当严肃地把隐喻视为语言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一点让我把他们和其他对隐喻这一主题进行论述的著述家区别开来。尼采以一种极为慎重的态度考察隐喻,以至于认为它是语言“最基本的原理”,而我们所谓的“字面言谈”则不过是隐喻的一种凝固的积淀。我将在第4.4节中详细分析尼采的这种观点。帕斯卡尔根据与尼采迥异的理由对隐喻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如果说尼采是论述本书最后一部分内容时所能引用的最合适人选,那么,帕斯卡尔的观点对于本书起始部分的论述则是极有助益的:不仅因为他以一种打动人心的方式激起了(或者说再次激起了)人们对隐喻问题的兴趣,而且也由于他所提出的某些思想主题对于任何关于隐喻的哲学反思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3] 《思想录》(*Pensées*)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圣经》(*the Bible*)中的比喻性语言。为什么《圣经》这样的文本[尤其是《先知书》(*the Prophets*)中的篇章]充满了比喻?帕斯卡尔首先对以下问题作了澄清:所谓“犹太人之王”、犹太人“击溃其敌人”这样一些字句的指称,以及诸如此类的内容,实际上都是比喻性的,而不是政治或军事方面的术语。他的这种做法有许多根据。如果《圣经》中的语言不是比喻性的,那么,它所作出的各种预言不仅与上帝不相称,同时无法避免产生一种内在的、“显著的、整体性的矛盾”。¹此外,对于“为什么这种语言必须是比喻性的?”这一问题,如果无法给出一种合理的解释,这种语言的比喻性就难以确定。毋庸置疑,上帝和《先知书》的作者们能够用某种“直接的”方式去表述那些无论如何都能说成是“直接的”内容;他们选择以一种非直接的、隐晦甚至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思,这难道不是表明了他们自身的某种缺陷吗?如果《旧约

全书》(the Old Testament)中的有关章节是字面的,那么似乎可以宣告上帝是不完善的(但如果这些章节并不是字面的,上帝仍将受到这样的指控)。

对于为什么上帝需要以比喻性的方式来传达其意思,帕斯卡尔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论点。首先,“如果弥赛亚的态度已经”“被清楚地预言”是正确无误的、字面的,那么犹太人将拒斥基督的预言就不可能实现。其次,犹太人是一个如此“世俗的”族群,以致“缺乏”那种将《先知书》所传达的纯粹精神性信息“纳入心灵之中”的能力。例如,如果他们终有一天会战胜自己的情欲”这一预言伪装成他们终“有一天将征服巴比伦人”的消息,那么,他们就将“缺乏保存其书籍和仪式的热情”。帕斯卡尔指出,《旧约全书》是一道“密码”,“善”和“正义”能够对它作出正确的解读,“俗欲”却对它作出了错误的解读,但犹太人在其无知中仍然推进了上帝的目标。再次,人们无论如何“喜爱各种象征”,通常也热衷于那些“具有特殊感染力的文字”。最后,特定的比喻是必需的,因为“关于上帝的事情是不可表达的,它们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言说”。²

我不知道,帕斯卡尔对《圣经》比喻语言这一难题的解决在神学家心目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但对于隐喻这一主题来说,帕斯卡尔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对这个特殊难题的回答。帕斯卡尔并没有把他的思想局限在《圣经》的语言问题上。他极具现代感的思想证明:在绝对权力无法保证人们

[4] 服从于权威的时代,比喻性言谈有助于强化对“想象力的约束”,而这是“保证尊敬某个特殊的人”所需要的。³ 在这里,我将给出一些之所以要阅读帕斯卡尔著作的理由。首先,他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最先认识到确定比喻性言谈的困难、并对此提出一般性检验标准的著述家之一。因此,某个言说是一个“显著的、整体性的矛盾”这一事实,显而易见地成为这一言说非字面性的符号。其次,帕斯卡尔和黑格尔(Hegel)一样,是那些试图解决“人们为何从根本上来说是在隐喻地言谈?”这一问题的少数著述家之一。当然,帕斯卡尔认为,与“他们喜欢隐喻”类似的答案是不充分的。用他自己的一个类比来说:从表面上看,比喻性言谈就和“为了对称的目的而增加错误的窗户”这种做法一样怪异。⁴ 他认识到:隐喻本来不应当产生,或者应当比“交流的本性和目的”通常所要求的情况产生得少。比人们对于“比喻性语言标准”的需要和“人们为何参与其中”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帕斯卡尔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方式。因为,他几乎是持有这种观点的唯一一人:归根结底,非字面言谈的确定需要一种对它为何参与其中的原因、作用和功能的